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起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研究

任晓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起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研究 / 任晓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0526 - 6

I. ①中… II. ①任… III. ①社会主义 - 政治思想史 - 中国 - 近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126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史上若干重大分歧问题研究”
(11JJD710012) 阶段性成果

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陕
教高〔2015〕16）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思想对物质的超越：近代中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	(7)
一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源起的特殊“历史场域”	(7)
二 洪秀全的农民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 第一个形态	(12)
三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个 形态	(19)
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个 形态	(32)
五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史前” 特定性	(42)
第二章 思想与物质的平衡：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转变	(52)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53)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转变的开始 ...	(63)
三 从“二次革命论”到“一次革命论”：中国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转变中的不成熟理论形态	(81)
四 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转变中的畸形理论形态	(89)
五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转变的 完成	(102)

第三章 思想对物质的背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	
介入	(122)
一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观念基础	(122)
二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在中国的确立	(133)
三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在中国的强化	(144)
第四章 思想与物质新的平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167)
一 “文化大革命”的特殊“遗产”与中国改革的任务	(167)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萌动与社会推动	(172)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规定性与物质规定性新平衡	
的建构	(182)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两种规定性的平衡	(195)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体制与两种规定性的平衡	(207)
结语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31)

绪 论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中，中国所处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为这种变化的历史条件的体现和反映在经历了“自在”的发展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转向“自为”的发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并最终汇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对历史的发展来说，“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①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历史发展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其实就是一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提供思想环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历史主题并最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兴起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的历史。在这种比较宏大的背景下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个特定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因此，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层面来研究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关系，无论在学术上、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源的认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①,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以重要思想人物为核心的思想史的梳理和近代中国历史中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比较。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深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涌现出许多新的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郑大华曾针对近代社会主义的研究说:“研究社会主义,应把它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理路和进程中加以研究,这样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②具体地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在下面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第一,要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演进发展的内在规律的研

① 代表性的成果有:在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刘其发编:《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曹锡仁:《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彭明:《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研究方面,主要是王兰垣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允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历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继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郑大华、邹小站编:《近代中国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程伟礼、戴雪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等。关于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不同思潮的比较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海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断代和重要人物为主,可参见[美]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全政、符致兴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此外,围绕着中国共产主义的形成,国外学者也有一些重要成果,比如,Arif Dirli,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ichael Y. L. Lu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如果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取得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成果有: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郑大华:《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载郑大华、邹小站编:《近代中国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究,并构建一个对这一内在规律进行科学解释的学术框架和体系;第二,对于近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和解释体系似乎判若两出,因此迫切需要形成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研究框架;第三,对于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放置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互动来加以认识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基本上是无人问津^①。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为视角,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演进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承担的重要时代任务。

19世纪后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拉布里奥拉在论述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推进学术研究时曾说,必须“要花最大的思考力来了解直接的经验给我们提供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画面,以便把它的基本因素归纳为一个起源系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坚信,如果我们从事某种具体的历史研究,我们就必须把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彼此孤立的事实,那些五花八门的事件,一句话,那种对历史的经验主义研究——它对后来变为半教条的因素产生了信仰——当作它的出发点”^②。这是从方法论的层面就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对历史进行具体学术研究的科学阐述。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来看,必须要在似乎是“彼此孤立”“五花八门”的现象中还原或者说建构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的科学解释体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演进,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性过程,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历史和思想节点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以自身特殊的方式源起并走完了空想主义的发展阶段;二是20世纪

^①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比如陈金龙《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澍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0页。

初期，在十月革命所形成的世界历史变革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遭遇；三是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转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三个节点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演进中所包括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思想之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既是近代中国苦难现实的思想反映，同时又是对于走出这种苦难、实现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的思想引领。可以说，与民族主义一样，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是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想“都有感染力、辐射力的一种‘共同观念’”^①。

本书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历史嬗变为主线，系统地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基本规律。具体地说，本书的研究试图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这两个问题统一起来加以研究，或者说，是试图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史的研究。

在本书的整个研究中，基本的线索和立足点是意识思想和历史的统一性，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观点所形成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假如物的结构、人的结构和观念的结构不是相互适应的话，社会就无法存在”^②。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本书尝试运用思想规定性和物质规定性这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程。由此，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即思想对物质的超越、思想与物质的平衡、思想对物质的背离以及思想与物质新的平衡的建立，以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起为着眼点试图来构建

① 俞祖华、赵慧峰：《社会主义：现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共同取向》，载郑大华、邹小站编：《近代中国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② 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何国贤等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一个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比较宏观的学术框架和解释体系。

思想对物质的超越，主要是涵盖了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初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超越了历史条件的制约后形成的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不同形态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在理论的科学性上是错误的，但是由于深深地嵌入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环境之中，由此也就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整个历史发展的主题。思想与物质的平衡，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历史阶段。20 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思想的建制化，即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形成，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但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欧洲的历史环境，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只是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它本身并不能代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自身的科学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却完全不同的问题，因此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围绕如何认识和领导中国革命这一主题所形成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思想对物质的背离，主要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由于在当时冷战的世界政治背景下苏联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介入性影响而发生了变异，从而使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在逐渐脱离了中国实际后进入了误区。思想与物质新的平衡的建立，这一部分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历史阶段，主要是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及其思想实质，及其在新的时代和发展条件下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规定性和物质规定性的平衡。

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

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①。因此，本书的研究并不试图全部罗列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而重点考察和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和历史环节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联。本书研究中的最主要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意识形态深深地扎根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环境之中，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从广义上来说，这一点其实已经包括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所标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点之中了，但是具有相对独立的重要学术意义。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的时代特征，从而也就更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思想使然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第一章 思想对物质的超越：近代中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的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的一种思想反映，就已经以一种“自在”的方式出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并逐渐演化出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态。近代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历史主题和历史路线，即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超越世界范围内劳动与资本斗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国家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重新整合。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主要还是依靠“幻想的条件”来展现这一历史主题和历史路线，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则开始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向科学发展，使得这一历史主题和历史路线具备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支撑。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内在支点在于社会经济条件的落后性产生的物质规定性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规定性之间的一种历史平衡。

一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源起的特殊“历史场域”

如同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所开创的漫长的空

想主义思想发展阶段一样，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前，近代中国也出现了自身特殊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独特的“史前”形态。不过，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受制于并反映资本与劳动的早期斗争及其发展不同，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场域”中源起并获得了自己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思想样态。

19 世纪 40 年代，中国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侵略中开始步入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说，欧洲的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那么，中国的近代史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在西方国家的外力打断了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并开始强行把中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几千年来依靠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思想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小农主义“三位一体”来维系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中国开始摆脱了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取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①的带有整个东方“亚细亚”社会特征的历史发展模式，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入了一个由传统生活方式崩溃、西方殖民化所导致的剧烈社会动荡之中。内部的衰败化和外部的殖民化，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下沉。但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这种社会下沉、不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②正是中国人民一次次的不驯服和持续性的反抗，近代中国才没有像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印度那样，迅速屈服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什么印度对西方殖民统治的屈服要比中国早，而且屈服的程度要深？对于这个问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中指出了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印度莫卧尔王朝的力量和权力已经衰落，二是印度的商人阶级开始崛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2 页。

这一阶级与西方的利益有密切的联系^①。其实，这两个因素在近代初期的中国同样可以找到，因此，可以说上述两个原因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这一点。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使得近代中国社会没有成为受某个西方宗主国统治的完全的殖民地，而形成一个受制于不同宗主国却又表面上维持着主权的特殊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说的，“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②。

近代中国人民对于外部力量的反抗，既是物质层面的，又是思想层面的。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康梁变法、义和团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体现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物质性反抗。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力量，不仅仅在于物质性的存在，而且还在于思想性的存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③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过程中，面对社会动荡、面对人民的苦难、面对摆在人民头上“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在进行“武器的批判”的同时，还不断锻造着“批判的武器”，不断进行思想上的反抗，试图寻找对现实苦难的思想超越，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美好的未来社会蓝图，从而形成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3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648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

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态^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这种积极反应和探索,表明他们已经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关于进化以及公正和道德事业的新因素”^②,从而推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断升华。

关于西方侵略这一外部因素和中国的自身特点这一内部因素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关系,国内学者侯且岸认为,近代中国“很多历史现象不通过外部取向很难说明的。起码,离开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中国

① 一般来说,近代中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指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但不是说,近代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只有这三种形态。20世纪初期梁启超、江亢虎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构成相对独立的思想形态。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期旅欧后虽然也开始论及社会主义,但多是比附着中国古代的“井田制”而言的,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梁启超始终坚持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发源于中国古代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闻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梁启超这里的认识就其融入对社会主义的民族性理解而言,是有道理的,但是终究不能够用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去阐述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的社会主义的。江亢虎作为第一人在中国正式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中国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者,大同之主义,非差别之主义。不分种界,不分国界,不分宗族界,大公无我,一视同仁,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绝对亲爱。”参见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江亢虎在辛亥前后对社会主义的传播以及中国社会党的创建,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历史实际中移植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产物。参见汪佩伟《江亢虎研究》,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5页。此外,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有时还把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历史上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看作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的理论和实践。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确实具有空想性的特点,但是很难说,就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形态。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还会出现空想性的理论和实践,其特殊性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际的脱离,而不纯粹是一种空想性的产物,这是与此前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本书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考察对象。

② Michael Y. L. Lu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

近现代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内部取向也不宜绝对化”^①。正是这种外部取向性的因素，如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部取向性的因素，如封建主义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帝国体制变迁逻辑的影响等，推动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从而也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源起的特殊历史境遇。如果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相比，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场域”的特殊性其实在于近代中国所承担的双重历史课题，一方面，要求反对封建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则又必须要反对资本主义并避免和超越资本主义^②。在这种双重历史课题的基础上，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在源起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特殊性：第一，它主要不是建立在劳动与资本矛盾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中国的反抗这一民族矛盾斗争的基础之上；第二，它不是简单地诉求劳动的解放，而是把民族的生存、解放和发展置于首要地位；第三，它的力量主要在于对现实的思想超越，而缺少对现实的实际矫正力量；第四，它主要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批判封建主义的产物。但是，由于在西方国家侵略过程中，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形成，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中也逐渐夹杂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因素；第五，它基本上是先进的中国人在没有系统全面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是凭借着自身的历史冲动和阶级本能独自提出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和社会蓝图；第六，它虽然起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之中，却展现出了对全人类的关注和仁爱，把传统儒家的“仁”放大到了极致，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中国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无论是洪秀全的农民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共产主义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条件下体现出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历史场域”的特殊性。恩格斯曾经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

①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② 参见曹锡仁《幻想与实现，中国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